

试论明代方志建置图准确性问题

——以嘉靖《陕西通志》为中心*

田大刚

提 要: 方志地图属于古舆图的一种特殊类型, 对其准确性的研究, 以往多采用测绘学的理论方法探讨其数学意义上的准确性。通过选取方志地图中的一种主要类型——建置图, 以城墙轮廓为核心, 从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对其内容进行验证和将民国以来的实测地图与其进行比照等两种思路、方法对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虽然个别建置图不大准确, 但大多数建置图是具有一定准确性的。通过对建置图准确性问题的探讨, 继而总结出其绘制的手法, 认为建置图的绘制具有一定的方法准则。

关键词: 嘉靖《陕西通志》 建置图 方志地图 准确性 绘制手法

引 言

我国自宋元以来编纂了大量地方志书, 这些方志中一般含有数量不等的地图。方志地图种类多样, 内容详略各异, 有宏观的区域图、山川图, 也有微观的建置图(即城市图), 甚至还有内容更加细致的建筑布局图等, 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史料。由于方志地图多采用传统的近乎山水画似的方法绘制, 加之地图绘制者的知识水平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千差万别, 从而使得方志地图的质量良莠不齐。因此, 在利用方志地图进行相关研究时, 不能拿来即用, 而应该像探讨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那样对方志地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

目前学界对于方志地图的研究或关注其发展史和总体情况, 如唐雅芝《方志地图的起源和发展》^①、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②、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③等; 或探讨其数学意义, 如胡邦波《景定〈建康志〉和至正〈金陵新志〉中的地图初探》^④、姜道章等《明代方志地图的研究》^⑤、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⑥等; 或关注其所呈现的内容, 如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⑦、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⑧、罗艳春《明清时期的县城: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西北地方媒介传播西医防疫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CXW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唐雅芝:《方志地图的起源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3期。

② 参见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2期。

③ 参见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津图学刊》2003年第3期。

④ 参见胡邦波:《景定〈建康志〉和至正〈金陵新志〉中的地图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⑤ 参见姜道章、刘廷祥:《明代方志地图的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研究报告》1995年第8期。

⑥ 参见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⑦ 参见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⑧ 参见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①等；或关注其绘制者、绘制手法、表现形式及蕴含的思想，如潘晟《试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②，龚缨晏《论明代象山县志上的地图》^③，洪健荣《清代台湾方志舆图的政治文化意识》^④以及“城市笔记人”《一张明代方志地图呈现地貌的方式》^⑤等。此外，美国学者范德（Edward L. Farmer）另辟蹊径，对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⑥

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对方志地图的研究多为综合性的，专题性的研究较少。对方志地图准确性问题的探讨，则多为附带性的，如前揭阙维民、姜道章等学者均涉及此问题。不过，笔者认为这种用于衡量近现代测绘地图的方法其实并不适用于采用传统方法绘制的方志地图。对方志地图准确性问题的研究，应该根据其特点，采用分析、对比的方法对其所描绘的各类要素和所呈现的空间信息进行研究，只要图中多数要素的位置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那么，便可以认为该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甚至科学性，而不一定要强求其数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胡邦波在使用测绘学理论对宋元方志地图进行定量分析时，便采用古今地图对照的方法对方志地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了探讨。^⑦范瑛通过将民国县志中的实测城市图与清代方志中的城市图相对比的方法对方志城市图进行研究，得出清代四川方志地图在反映城市形态时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的结论。^⑧然而，其用以对比的城市图多来自19世纪纂修的方志，而这一时期近代测绘理念在一些方志地图的绘制中已有所采用，准确性显然要比之前的方志地图高一些，使用这一时期的方志地图可能会对作者的判断造成一定的影响。无独有偶，美国汉学家夏南悉（Nancy·Steinhardt）也通过将方志中的两宋都城图及其考古复原图进行对比的方法探讨了方志城市图的准确性。^⑨不过，上述学者所采用的用以对照的今（实测）地图的精度其实并非很高，并且仅仅通过简单的古今地图对比的做法在证据上略显单薄，还应当结合文献记载对方志地图进行必要的分析，这样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得出的结论才能够更加可靠。

嘉靖《陕西通志》是明嘉靖年间由时任陕西巡抚赵廷瑞主持监修，马理、吕柟等当地学者纂修而成的有关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的一部内容丰富且史料价值极高的通志。嘉靖《陕西通志》很可能是目前已知载录地图数量最多的地方志^⑩，地图类型涵盖天文、地理、

-
- ① 参见罗艳春：《明清时期的县城：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 ② 潘晟：《试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74—81页；潘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第115—124页。
- ③ 参见龚缨晏：《论明代象山县志上的地图》，张伟主编：《浙东文化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246页。
- ④ 参见洪健荣：《清代台湾方志舆图的政治文化意识》，《辅仁历史学报》第35期，2015年，第153—206页。
- ⑤ 参见城市笔记人：《一张明代方志地图呈现地貌的方式》，《建筑师》2010年第3期。
- ⑥ 参见[美]范德（Edward L. Farmer）著，吴莉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 ⑦ 参见胡邦波：《景定〈建康志〉和至正〈金陵新志〉中的地图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
- ⑧ 参见范瑛：《清代四川城市发展与空间形制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76—182页。
- ⑨ 参见Nancy·Steinhardt：《Mapping the Chinese city: The imagine and reality》，转引自城市笔记人：《一张明代方志地图呈现地貌的方式》，《建筑师》2010年第3期。
- ⑩ 参见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津图学刊》2003年第3期。

疆域、建置、河流水系、祠庙等多个方面,其中仅建置图^①便有134幅,囊括当时陕西地区的每一座府、州、县以及卫所城市。该图描绘了城墙的基本轮廓,对城内街道、各类机构与建筑的标注也较为详细。不仅如此,每一幅建置图(庆阳府城除外)都注有城墙的周长、高度和城池宽度等。由于陕西等地流传下来的明代方志数量较少,即使那些有幸流传下来的也不一定都有建置图^②,因而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便成为大多数陕西等省区城市现存最早的城市地图。

在探讨准确性问题之前,对该图的技术性问题略加说明。在方位方面,从图名(专名加通名)、方位标注和说明文字的方向(每一幅建置图均在图幅的上方中间标“南”字,下方标“北”字,对城池规模的说明文字均与图名保持上南下北状)来看为上南下北,但从对要素字体的方向的标注来看,其方位基本上属于上北下南型。另外,由于属传统手法绘制,该图并无比例尺,也未标注图例信息,而是“用高度象形图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③,如将府、州、县治等形象地绘制成房屋状等。

就方志建置图而言,其准确性一般可从城墙轮廓、城内外设施与城门的位置、街道布局及其走向、城郭与山川的相对位置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本文选取其中最主要也是最直观的城墙轮廓这一方面进行探讨,即本文所谓建置图的准确性主要是指其对城墙轮廓的描绘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具体到对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准确性问题的探讨,可从两方面入手。其一,使用成书时间与嘉靖《陕西通志》相近的文献记载的同一城池的情况对建置图呈现的城墙轮廓进行验证;其二,利用近代以来的城市实测图与建置图的城墙轮廓进行对比验证。下面拟从以上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 从同时期文献看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准确性

成书于嘉靖《陕西通志》之后的明代方志是本文探讨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准确性问题的重要材料,可供本文使用的主要有嘉靖《高陵县志》、嘉靖《河州志》、嘉靖《渭南县志》、嘉靖《平凉府志》,以及崇祯《礼泉县志》等。

嘉靖《高陵县志》谓其城“周四里二百二十步,广二百七十步,袤一里二百步”^④。据此可知,高陵县城墙南北长度是东西宽度的2倍,则其城墙轮廓为南北长,东西狭的矩形。^⑤通过测量可知,嘉靖《陕西通志》高陵县建置图(参见图1)所示城墙轮廓明显呈东西稍短、南北稍长的矩形(南、北城墙与东、西城墙的比值均为6.8:8)。虽然长度并非宽度的2倍,但也足以说明该图所呈现的高陵县城墙的轮廓与嘉靖《高陵县志》的文字记载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建置

① 有关城市的地图均位于嘉靖《陕西通志》卷七至卷九之《土地·建置沿革》之建置沿革文字说明之前,因此,本文根据来源将该城市图称为“建置图”。另外,本文提及之建置图不再一一出注,均见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1册,第127—193页。

② 如正德《朝邑县志》、正德《武功县志》、嘉靖《重修三原志》、嘉靖《澄城县志》等均缺地图。

③ 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 吕柟纂修:嘉靖《高陵县志》卷1《建置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册,第406页。

⑤ 高陵县城地处渭河平原,地势平坦,一般而言,在这样的地形上修建的城池是比较规则的,从长宽不一来看,其城墙轮廓当为矩形。

图所注“城周四里二百二十步，高三丈，池深二丈五尺”^①的文字说明也与嘉靖《高陵县志》相关记载一致。因此，高陵县建置图所反映的当是其时高陵县城的真实情况，从而说明该建置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非偶然，应与纂修者的纂修理念及其所采用的资料有密切的关系。嘉靖《高陵县志》的纂修者为高陵著名学者吕柟，正是嘉靖《陕西通志》的两位主要纂修者之一。对于嘉靖《高陵县志》的纂修情况，高陵人刘杰在为其跋中说：“（吕柟）谨按旧志，广询博访，质诸故老，考诸史传，订讹去伪，拾遗补缺，越三月搜集成编。”^②可见，吕氏在纂修是书时在旧志的基础上搜集、参考了大量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了甄别与考订，甚至还通过实地采访获取与核验材料。因此，其资料的准确度和可靠性是比较高的，据此纂修而成的《高陵县志》应当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也就是说其对高陵县城池的基本情况的记录和建置图的绘制应当是比较准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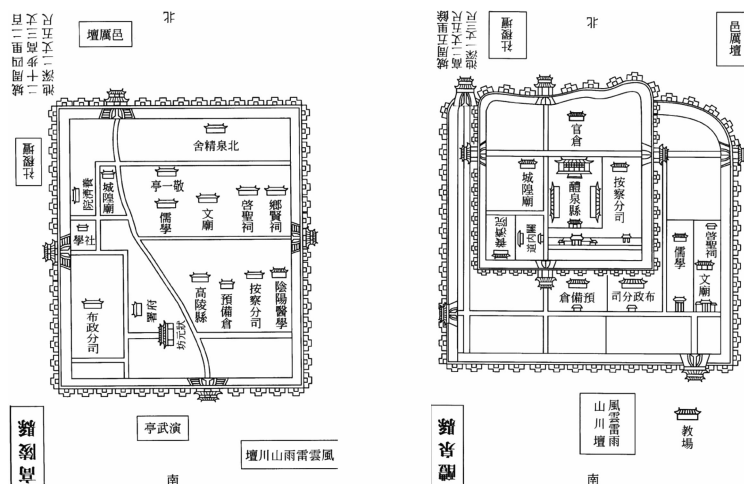


图1 嘉靖《陕西通志》所附高陵县（左）与礼泉县（右）建置图

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嘉靖《高陵县志》的刊刻时间是嘉靖二十年（1541），而嘉靖《陕西通志》的完成时间则为嘉靖二十一年，两者在成书时间上仅相隔一年。这说明《高陵县志》很有可能是吕氏在纂修《陕西通志》时利用其所收集和接触到的大量资料纂修而成的，两者的资料来源具有一致性。而作为两本志书的共同作者，吕氏的纂修理念和标准也应该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不仅高陵县这一幅建置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甚至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整体上可能都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据嘉靖《河州志》记载：“（河州城）周围九里三分，南北长二里有半，东西长二里又百步。”^③可见，河州城墙的轮廓似为矩形。明河州城即今甘肃省临夏市，地处大夏河河谷平原一带^④，地

① 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卷7《土地五·建制沿革》，“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1册，第128页。

② 吕柟纂修：嘉靖《高陵县志》卷1《建置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6册，第400页。

③ 吴祜纂修、刘卓增订：嘉靖《河州志》卷1《地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0册，第13页。

④ 参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

势较为平坦，其城墙有修建成规则形状的地形条件。同时，结合《河州志》卷首仅存的半幅将城墙轮廓描绘成矩形的《州城图》^①来看，河州城城墙的轮廓当为较规则的南北稍长、东西稍短的矩形。通过测量可知，嘉靖《陕西通志》河州建置图中城墙的轮廓同样是南北稍长、东西稍短的矩形，只是将城西北角略微内缩而已，仅与《河州志》的记载略微有所出入，这样的差异其实并不影响本文从整体上探讨建置图的准确性。因此，可以说嘉靖《陕西通志》河州建置图对河州城（墙）轮廓的描绘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即河州建置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嘉靖《渭南志》是曾任绍兴知府的南大吉纂修的一部十分特殊的县志，不同于一般的志书作者，南氏在纂修是书时格外重视地图的作用，强调“凡造书者，图固不容略也，尝考六经图，凡三百又九，岂其粗简，若后作者观之，令人闷翳而弗豁朗以省哉？兹志所以首备诸图，岂其文侈是为？亦欲观者先图后事，往躅前范，展卷即可览见也”^②。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南氏在《渭南志》卷首安排了大量的地图，总数达40幅，不仅包括县境、城池、县治、祭祀设施等普通方志所共有的地图，而且还设置了古迹、泄水渠、道路与渡口等专题性地图，这在县志中是不多见的。每一幅地图都配有丰富的文字注记，如在“县城图”中不仅记载城墙的周长，而且还记载每面城墙的高度与厚度。

对于嘉靖《渭南志》，南氏门人李宗枢这样评价：“乃博摭籍传，洞窥今昔，错综隐括，作渭南志云。”^③李氏的评价当并非过誉之词，从一些建筑图的内容和文字注记来看，南氏在绘图时无疑参考了大量的材料，甚至有实地走访。如其在《演武场图》中写道“计地二十四亩零”，又“东与民地相接，西绕酒水，南、北俱沙滩”，又“南北长一百二十又五步，东西阔，两头皆四十又五步”^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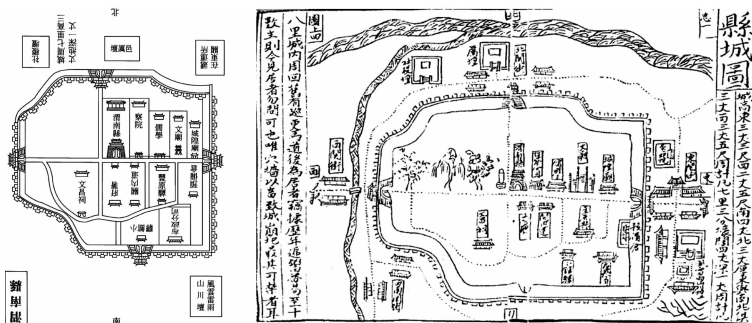


图2 嘉靖《陕西通志》所附渭南建置图（左）与嘉靖所附《渭南志》“县城图”（右）

需要指出的是，南氏在绘图技术方面，按照各类地区的特点，因图制宜采取上北下南、上南下北、上西下东等三种不同的方位，属姜道章所说的“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即多方向定位”^⑤，其中《县境图》《县城图》等采取上北下南的方位。

能够以一己之力绘制出40幅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注记详细的地图，首先南氏必当掌握非

① 吴祜纂修、刘卓增订：嘉靖《河州志》卷1《地里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0册，第5页。

② 南大吉纂修：嘉靖《渭南志》卷1《诸图上》，“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13册，第3页。

③ 南大吉纂修：嘉靖《渭南志》卷首《叙》，“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13册，第1页。

④ 南大吉纂修：嘉靖《渭南志》卷1《诸图上》，“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13册，第10页。

⑤ 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常丰富的地理知识，并且具有较强的空间观念；其次，南氏应当对渭南县城甚至整个渭南县城都是比较熟悉的，并且做过实地探访；最后，南氏在纂修文本和绘制地图时应当依据了大量的比较可靠的材料。是故，其所绘制的地图应该能够如实地反映当时城墙的大致轮廓和城池内外的基本情况。因此，可以认为南氏绘制的包括《县城图》在内的各类地图应当是比较准确的。

对比嘉靖《陕西通志》渭南县城建置图与嘉靖《渭南县志》之《县城图》^①（参见图2）我们发现，虽出自不同的绘制者，但二者对渭南县城墙轮廓的描绘却惊人地相似，都是呈现出东、南两侧规则，西、北两侧不规则的形状。不仅如此，二者在城内街道的位置与走向、县治以及文庙等设施的位置标注方面也是一致的，说明二者对渭南县城的描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者的主要区别仅在于对城外设施和景观的描绘，这方面《县城图》显然比建置图更加细致。当然，这并非嘉靖《陕西通志》的资料不够丰富亦或是纂修者的失误，而是由其纂修体例决定的，在所有134幅建置图中仅有三原、旬阳、紫阳这样的城池紧邻山川的县才会像《县城图》那样描绘有城外山川，其余绝大部分则只是描绘城外的礼制设施和驿站等。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南氏所绘《县城图》准确性较高，因此，与其相似的嘉靖《陕西通志》渭南县城建置图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全都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其实也存在与城墙的实际状况有所偏差的情况。譬如，对于礼泉县城墙的规模，崇祯《礼泉县志》载：“旧城周二里余一百步，城元末枢密院副也先速迭儿增筑，土城，高二丈五尺，东西二百二十五步，南北二百五步，周一里许……成化四年，知县撒俊增筑东、西、南三面外城，六里有奇。”^②说明礼泉旧城的城墙轮廓并非方形，而是东西稍长、南北稍短的矩形。

然而，通过测量可知，嘉靖《陕西通志》礼泉县建置图（参见图1）中旧城城墙的东西长度与南北宽度几乎是一致的，而自嘉靖至崇祯时期礼泉旧城的规模并未发生变化^③，说明礼泉县建置图的绘制与实际状况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应该注意到，礼泉县城北临泥河，城墙走向受泥河的影响呈现出弯曲状，而礼泉县建置图中的内、外两城的北城墙均呈现出弯曲的形状，无疑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尽管略有不足，但就整体而言嘉靖《陕西通志》礼泉县建置图仍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除以上能够证明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的案例外，笔者尚发现一则反例，如嘉靖《平凉府志》谓其府城“周九里有奇，西广而东隘，北高而南庳，横长而纵短”^④。说明平凉府城的大城城墙实际上呈现出东西长，南北短，城区西部宽，东部窄的格局，类似于一只平躺着的葫芦（其志所附之图便将平凉府城绘制成了葫芦状的形态^⑤），而非嘉靖《陕西通志》平凉府城建置图（图3）中的均匀且基本规则的城墙轮廓。

不仅如此，建置图记载的平凉府城“城周十一里三分”^⑥与《平凉府志》记载的“周九里有

① 南大吉纂修：嘉靖《渭南县志》卷1《诸图上》，“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13册，第5页。

② 苟好善纂修：崇祯《礼泉县志》卷1《地里志》，“明代孤本方志选”，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1册，第625—626页。

③ 成书早于嘉靖《陕西通志》的嘉靖《醴泉县志》同样记载旧城“东西二百二十五步，南北二百五步”，说明自嘉靖至崇祯时期礼泉旧城并未发生改变。详见夹璋纂修：嘉靖《醴泉县志》卷1《土地类·城池》，明嘉靖十四年（1535）刘佐刻本。

④ 赵时春纂修：嘉靖《平凉府志》卷1《城郭》，“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13册，第7页。

⑤ 赵时春纂修：嘉靖《平凉府志》卷1《平凉府城图》，“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13册，第6页。

⑥ 赵廷瑞修，马理、吕柟纂：《陕西通志》卷8《土地五·建制沿革中》，“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1册，第160页。

奇”的规模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到底哪种记载更加可信?《平凉府志》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较《陕西通志》成书时间晚18年。那么,在此期间平凉府城是否有过缩城之举?对此,嘉靖《平凉府志》缺而不载。乾隆《平凉府志》记载其府城的历次修筑情况:“府城,自唐德宗令刘昌增筑,元末李思齐部将元亨分为南、北二城,明洪武六年总兵官平凉侯费聚修复如旧。周九里三十步……康熙八年,知府程宪、知县李焕然重修。”^①说明自洪武时期修缮之后,明代应当没有对其城进行拓展。《平凉府志》出自当地人之手,对当地的情况和材料无疑更加了解,因此,《平凉府志》对府城规模的记载当较为准确,说明平凉府城建置图的绘制较其城的实际情况有所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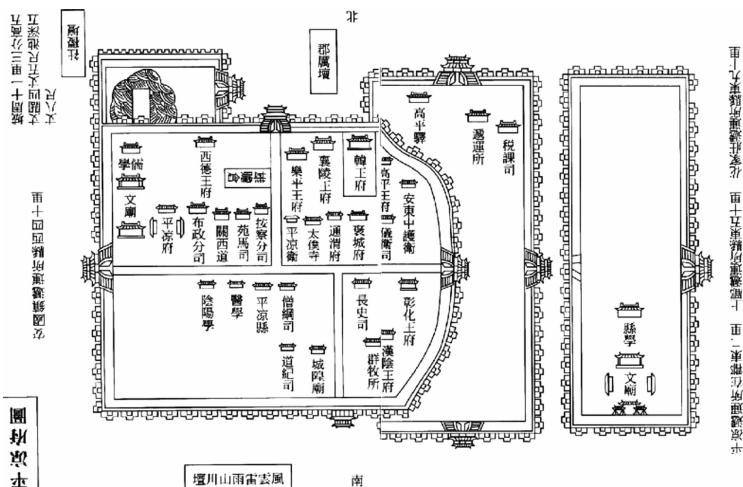


图3 嘉靖《陕西通志》所附平凉府城建置图

因此,仅从平凉府城的个案来看,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准确性可能要低一些。

通过对以上几个案例的分析探讨,可以认为就整体而言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应当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二 从实测图看嘉靖《陕西通志》所附建置图的准确性

虽然就同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上述案例毕竟数量有限,普遍性意义可能略显不足。若能借助精度较高的民国以来的城市实测图,将其与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进行对比来探讨建置图的准确性,无疑更加能够说明问题,结论也将更加可靠。

要将嘉靖时期的建置图与民国以来的城市实测图进行对比,其前提当然是建置图所反映的城池自嘉靖二十一年以来基本未发生变化,即城墙规模和轮廓等元素未产生明显的变化。限于篇幅,笔者仅通过翻检明清地方志并结合新修地方志等资料记载的今陕西^②城池的基本情况对城池是否发生过变化进行甄别,恕不一一进行详细考证,其甄别标准是自嘉靖至清末及民国时期城墙

^① 佚名撰:乾隆《平凉府志》卷6《城池》,“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5册,第373页。

^② 注:受笔者掌握的实测图资料覆盖区域的限制,本文仅选取位于今陕西省境内的明代府州县城的建置图进行甄别与对比。

规模与轮廓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城址是否发生过迁移,通过一一甄别,城墙规模(本文主要比较大城部分,一般不考虑关城)和城址均与嘉靖《陕西通志》成书时期的情况保持一致的有28座府、州、县城。

在确定了可资探讨的城池数量后,需对拟比较的实测图做一简要介绍。可供本文讨论的绘制有城墙轮廓的实测地图资料有两份:一为民国时期的陕西部分县市的城厢实测图(见图5),该图由陕西省地政局于1943年和1947年分两批进行实测绘制,比例尺从1:2000至1:1.5万不等,具有精度较高,内容详实的特点。该图很好地反映了城市尤其是城墙在当时的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一份是由陕西省民政厅于1959年编制的《陕西省各市县行政区划图》,该图同样绘制有陕西大部分县市的城区略图,比例尺较大(从1:3000至1:2.5万不等)、精度较高,描绘了明清城墙的基本轮廓,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

通过将建置图与实测图或行政区划图进行对比(即比较两者所呈现的城墙的轮廓是否一致),笔者将建置图符合实测图内容的程度即其准确度从高到低分为比较符合、基本符合与不符合等三种类型,其对比结果如表1和图4所示。

表1 城址、城墙轮廓无变化的府州县城建置图与实测图城墙轮廓对比表

序号	府州县	陕西通志图轮廓	民国实测图轮廓	行政区划图轮廓	符合度	城址、城墙轮廓无变化的主要依据
1	西安府	矩形	矩形		比较符合	乾隆《西安府志》卷9《建置志》
2	兴平县	倒“凸”字形		倒“凸”字形	比较符合	民国《兴平县志》卷2《建置志》
3	临潼县	矩形	略矩形		比较符合	道光《神木县志》卷3《建置志》
4	户县	矩形,缺西北角	矩形,缺西北角		比较符合	民国《户县志》卷2《城关》
5	周至县	矩形,缺西南角	类鱼形		不符合	民国《周至县志》卷2《建置志》
6	蓝田县	矩形	略矩形		比较符合	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7《建置志》
7	合阳县	矩形	矩形		比较符合	乾隆《合阳县志》卷1《建置志》
8	澄城县	矩形	矩形		比较符合	民国《澄城县附志》卷2《建置志》

(续表)

序号	府州县	陕西通志图 轮廓	民国实测图 轮廓	行政区划图 轮廓	符合度	城址、城墙轮廓无变化的 主要依据
9	韩城县	椭圆形	圆角矩形		基本符合	乾隆《韩城县志》卷2 《城池》
10	华阴县	矩形, 缺西 北角	略矩形		基本符合	民国《华阴县续志》 卷2《建置志》
11	耀州	矩形, 南墙呈 弧形	略矩形		基本符合	乾隆《续耀州志》卷1 《地理志》
12	乾州	规则龟形	不规则龟形		比较符合	民国《乾县新志》卷2 《疆土志》
13	邠州	缺角, 缺西 南角	多边形		不符合	民国《邠州县新志稿》 卷之2《治城》
14	宜君县	不规则椭圆形	多边形		基本符合	雍正《宜君县志》· 《城池》
15	凤翔府	梯形	类三角形		基本符合	乾隆《凤翔府志》卷2 《建置志》
16	宝鸡县	矩形, 北墙缺 角内缩	略矩形		基本符合	民国《宝鸡县志》卷3 《建置志》
17	眉县	矩形, 缺东 北角	平行四边形		基本符合	宣统《眉县志》卷4 《政录志》
18	陇州	矩形, 西北角 凸出	四边形		不符合	乾隆《陇州续志》卷2 《建置志》
19	凤县	椭圆形	矩形		不符合	光绪《凤县志》卷2 《建置志》
20	城固县	矩形	矩形		比较符合	康熙《城固县志》卷1 《建置》
21	宁羌州	略矩形	略矩形		基本符合	光绪《宁羌州志》卷2 《建置志》

(续表)

序号	府州县	陕西通志图轮廓	民国实测图轮廓	行政区划图轮廓	符合度	城址、城墙轮廓无变化的主要依据
22	商州	倒“凸”字形	倒“凸”字形		比较符合	1999版《商州市志·城乡建设》
23	镇安县	凹角矩形	四边形		基本符合	乾隆《镇安县志》卷5《建置志》
24	洛南县	矩形,西北角外凸	矩形,西北角外凸		基本符合	乾隆《洛南县志》卷2《地輿志》
25	旬阳县	椭圆形	月牙形		不符合	光绪《旬阳县志》卷4《建置志》
26	山阳县	矩形	矩形		比较符合	乾隆《直隶商州志》卷4《建置志》
27	汉中府	五边形	五边形		比较符合	
28	白水县	矩形	四边形		基本符合	

汉中府城虽然在明末时将北面城墙向北移动两丈多^①,但其城基本轮廓并未因此而发生显著变化,故本文将其视为城墙轮廓未变化者。白水县城虽然在嘉靖之后修建过外城^②,但其内城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时的城垣基本保持不变,并且在民国32年(1943)的实测图中轮廓仍然清晰可见。因此,同样视为城墙轮廓未变化者。

从图4来看,在28座府、州、县城,建置图的城墙轮廓比较准确和基本准确的比例高达82.1%,不准确的仅占17.9%,从而说明大部分的建置图是基本准确或比较准确的。因此,虽然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绘制方法和表现手法属于传统的示意性质,但其对城墙轮廓的描绘无疑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即该图的绘制当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并非方志纂修者凭空想象或随意为之。

应当指出,虽然本文探讨的明代陕西(省)包括了今天陕西省以外的省区,但受资料所限,本节仅以部分府州县城为例试做分析,因嘉靖《陕西通志》及其建置图具有统一而规范的纂修体例,因而,其结论也具有普遍适用性。

下面笔者在三种类型中各选取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建置图分别加以简要的分析、说明。

1. 建置图内容比较符合实测图即比较准确的,以户县建置图为例。从右侧的实测图(因实测图为晒蓝图,城墙不易辨识,故笔者将城墙轮廓勾勒出来以便观察、对比)来看,户县城墙

① 王行俭修,余孔捷纂:乾隆《南郑县志》卷3《建置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51册,第20页。

② 梁善长纂修:乾隆《白水县志》卷2《建置志》,“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6册,第4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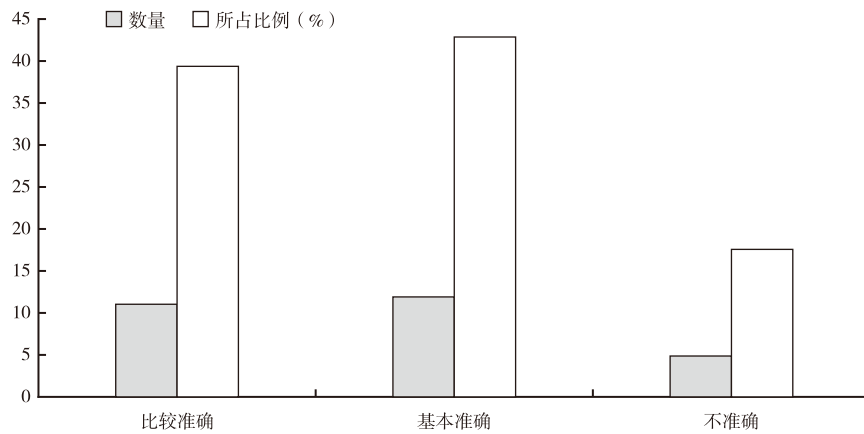


图4 建置图准确度类型及其占比

轮廓呈现出缺西北角的矩形状，而左侧的建置图亦是如此。同时，两图对城市主干道的描绘也基本一致（均有东西、南北大街，且所标注的位置基本一致），说明两图的重合度是比较高的。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建置图将曲折状的城墙予以“拉直”和矩形化、规整化处理，整体而言两者并无显著的差异。因此，建置图基本上符合实测图所呈现的户县城墙的轮廓。故本文将其视为比较准确型，类似的建置图还有西安府、合阳县、兴平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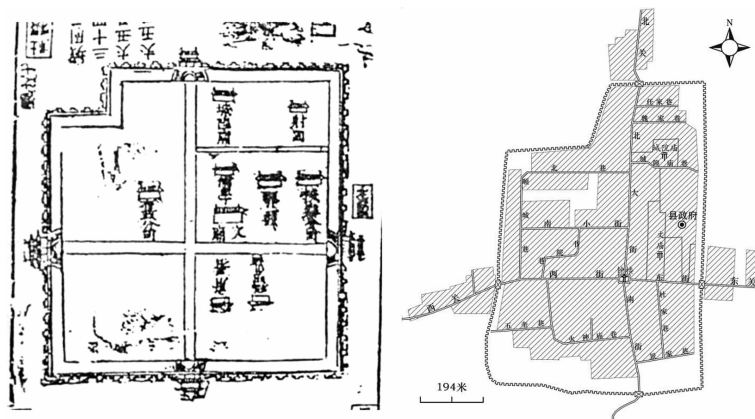


图5 户县建置图（左）与实测图（右）

2. 建置图基本准确的，以乾州建置图为例。乾州城始建于唐德宗时期，其城墙轮廓略呈龟形，故有龟城之称。对比实测图可知，建置图对乾州城的龟形城墙轮廓进行了对称化的变形处理和理想化描绘，将其从不规则的龟形描绘成了理想化的、规则的并且十分对称的龟形形状，同时将其稍微向西北倾倒的城市座向予以“扶正”。虽然与实际状况存在一定的偏差，但绘图者并未将其描绘成其他明显与实际轮廓不符的形状，建置图基本上还是反映了乾州的龟城形态，所以并不能算作失实即不准确的情况。因此，本文将其列入基本准确的类型，类似的建置图还有凤翔府、宁羌州、韩城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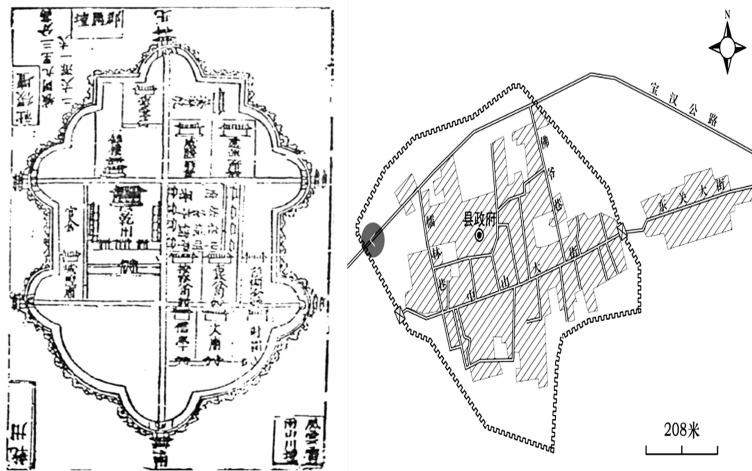


图6 乾州建置图(左)与实测图(右)

3. 建置图不准确的,以凤县建置图为例。从右侧的实测图来看,凤县城墙轮廓呈现出规则的多边形,尤其是南侧城墙的走向有明显的凹进城内的情况,而左侧的建置图则对其进行了圆弧形处理,将其城描绘成规整的椭圆形,显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说明建置图对凤县城墙轮廓的描绘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实。因此,属于不准确的类型,类似的建置图还有邠州、陇州、旬阳县、周至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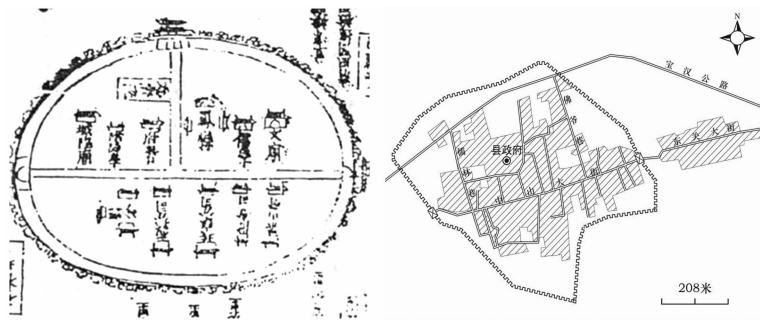


图7 凤县建置图(左)与实测图(右)

当然,被本文列入不准确类型的建置图实际上也并非毫无准确度可言,从地区分布来看,这些建置图不准确的州县除周至县较为特殊外均位于山区,其城墙轮廓受地形影响本就较为复杂,建置图有所失实也是在所难免的。由此可以联想到那些同样位于地形较复杂地区的城市,其建置图的准确性可能普遍稍差一些,而那些地处平原和较开阔的河谷地带的城市其建置图一般来说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譬如旬阳县城位于洵河汇入汉江的小半岛上,根据实测图和小半岛的地形地貌,其城墙轮廓大致呈现并且只能呈现出月牙形状,而旬阳县建置图^①则对其进行变形处理,将城墙轮廓以圆形的形态呈现出来。旬阳县城俗称太极城,将其绘制成规则形状,体现了人们对其

① 赵廷瑞修,马理、吕楠纂:《陕西通志》,“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1册,第155页。

城的认知。这无疑与姜道章先生所说的“在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观念,即以变形表示特别的观点”^①是基本一致的。

从以上案例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对城墙轮廓的描绘可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处理,即将不规则的城墙进行拉直、将较弯曲的城墙绘成直线、将呈折线状的城墙绘成曲线甚至是直线,以及将座向与子午线存在偏差的城市统一调整为正南正北的一般坐向等。

因此,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编绘可能存在规范的绘制方法和准则,即将不大规整的城墙予以规整化、标准化甚至是理想化的变形处理,以达到简洁明了、体例统一的目的以及达到整齐划一的效果,这样的效果无疑更加符合传统的观念。同时,也说明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形象化的问题。

最后,对嘉靖《陕西通志》所附建置图的绘制目的略加分析,葛兆光先生认为明清方志地图一般目中无“人”即主要标注政治与宗教方面的公共建筑,而忽视集市、街坊和其他私人生活空间。^②成一农先生则指出宋至清时期方志地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③。不过,这当与方志地图的属性有关。方志地图是地方志的一部分,主要由官方主导纂修,本来就缺少对一般民众的关怀。同时在具体绘图时受制于图幅大小的限制,绘图者只能按照自己认为的重要程度来选择性的主要标注涉“官”要素(与其说是涉“官”要素,不如说是公共建筑,这些被标注的建筑一般是涉“官”的,相当于现在的单位和机构)。公共建筑一般具有数量少、规模大、位置醒目并且与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因此,易于也需要被标注。而涉“民”的非公共建筑则很少具备这些特点,因此一般较少标注。此外,即使标注涉“民”部分,其可操作性也是较低的,除主要市场和大户宅院外,一般居民宅院和商铺则难以标注,也缺乏标注的意义。因此,较少标注涉“民”部分也不无道理。

不仅古代如此,即使是现代地图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些新修地方志中的城市图和城市略图除道路等基本要素外,一般只标注以政府机构为主的单位和公共建筑,而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要素或非单位则较少标注。

当然,主要标注涉“官”要素并不意味着方志地图只是为了满足地方治理的需要,其实也有助于学者和民众对其所在的城市的整体面貌的认识。

结 语

本文以城墙轮廓为分析对象,从文献记载验证和与民国实测地图对比两个方面对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探讨,整体而言该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当然,在开展具体研究时也不能对其不合理、不准确之处视而不见。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过于苛责古人,不能用近现代的地图标准和理念来衡量像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这样的属于示意性质的方志地图,在当时的绘图技术、绘图理念以及绘图者的知识水平下,能够将城墙的轮廓基本如实的描绘和呈现出来已经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此外,建置图的绘制手法也并非完全以写意为主,而是具有一定的写实成分。李孝聪曾指出:“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不仅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甚至还可以用具有“科学性”来

① 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参见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③ 参见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0—185页。

④ 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

进行评价。因此,苏品红“(方志)地图绘制欠精审,只追求美观、浮华,谈不上科学性和准确性,最多只能起到示意作用”^①的结论显得不够准确。而成一农将方志城市图置于“‘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②的标题和主题之下也可能不太合适。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就方志城市图而言,使用“准确性”而非“科学性”这样的术语来衡量和评价可能更加合理。

虽然本文只是以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为例进行的个案探讨,但其所得结论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修志的高峰时期,全国各地修纂了大量的诸如通志、府州志、县志、卫所志以及乡镇志等地方志,这些地方志大都含有用以反映城池概貌和城墙基本轮廓的建置图。对于明代方志的修纂方法,据巴兆祥研究,明永乐年间为修《一统志》曾颁布过《修志凡例》16则,对方志体例和基本内容做了统一规定。不少地区则颁布过与之配套的具体实施办法,譬如湖广布政司便于嘉靖年间颁布过详细具体的《修志凡例》,其中就对方志地图的内容做了明确的规定。^③对于城郭图的绘制,嘉靖《固始县志》载:“城列有堞,环有池,峙有楼,辟有门,中有公署、祠庙。郭分有关厢,有冈阜、场堰,有坛庙、桥津。”^④对比嘉靖《鄢陵志》^⑤与嘉靖《固始县志》会发现两者城郭图的内容和风格非常接近,这当并非偶然,而是当时可能存在统一的绘制规则。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虽然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对建筑要素的绘制与嘉靖《固始县志》略有不同,但两者所包含的要素以及对城墙的绘制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城门和街道都缺乏文字标注。因此,可以想见包括河南布政司在内的其他地区也可能同样颁布过类似的修志细则以及对包括城市图在内的方志地图的绘制准则。

此外,据今人研究,明代的方志地图,一方面为采用旧志图、地方舆图和历史地图编绘的地图;另一方面则由野外调查绘制或依据口述材料绘制的新地图。^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各地对方志城市图的编绘应当具有相似的方法和标准,采用这一方法和标准绘制而成的方志城市地图,其内容详略和准确程度应当是大致相仿的。从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案例来看,这类方志城市图应当基本上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每幅采用类似方法、标准绘制的方志城市图都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由于绘图者的个人素质存在差异以及所依据材料的质量各不相同,导致方志城市图的准确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当对所涉及的方志城市图进行必要的分析,尤其是那些城墙轮廓不大规则以及地处山区的城市需要格外注意并加以考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只是选取城墙轮廓这一个方面对方志城市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方志城市图内涵丰富,需重点探讨的对象尚有很多,譬如街道、建筑以及山川等。方志地图不同于近代测绘地图,也与其他古代舆图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对其准确性问题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价以及建立适合的评价体系尚需更多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相信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才能逐步建立起一套能够广泛适用于方志地图的评价体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全

① 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津图学刊》2003年第3期。

② 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③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98—103页。

④ 参见张梯修,葛巨纂:嘉靖《固始县志》卷1《图像志》,“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76册。

⑤ 刘切纂修:嘉靖《鄢陵志》卷首《县城图》,“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77册。

⑥ 参见潘晟:《试论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纂》,《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